

郑钦安学术思想及对附子临床应用的贡献

★ 罗昌国¹ 张瑞贤² (1. 湖南中医药大学 长沙 410007; 2.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 北京 100700)

摘要:就郑钦安学术思想进行了简单介绍,重点介绍了其温阳学术观点;同时对于郑钦安临床使用附子的根源进行了探讨,并对其在附子临床应用上的贡献作了简单概括。

关键词:郑钦安;学术思想;附子;学术探讨

中图分类号:R 249.49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关于郑钦安及其温阳学术思想引起许多中医学者的关注,各种报道时有所见。本人读硕期间,有幸在导师指导下,对郑钦安学术思想进行过粗浅的研究,发现郑氏学术思想确实有独特之处,尤其是对于附子的临床应用,更能突出其温阳思想,现就其学术观点及对附子临床应用作一简单介绍。

1 学术思想

郑钦安(1804~1901),名寿全,四川邛崃人。师从成都名医刘源(芷唐),道光(1821~1851)中叶悬壶于成都。其师刘源非以善用附子见长,其著作《医理大概约说》也未曾提及。可见郑氏又是一位“识用精微过其师”的了。然而,他当时到底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敢于突破传统观念而用姜、附呢?

内外皆寒,须用东垣参苏温肺汤。”《医宗金鉴·幼科杂病心法要诀·咳嗽门》^[20]首次将肺寒咳嗽与风寒咳嗽明确地加以区分,更把肺寒咳嗽列为咳嗽门之首,寓有深意,值得思考。明清时期的温肺法已发展成为完整的理法方药悉具的理论体系,随着治疗病种的不断的增多,温肺方剂数量也日益的增多,临床应用范围也在逐步的扩展。

综上所述,温肺法是中医儿科不可或缺的重要治疗方法,特别是在多种肺系疑难病、慢性病的治疗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可望为现代儿科临床提供有益的借鉴。

参考文献

- [1]黄帝内经·素问[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75.
- [2]汉·张仲景撰,何任,何若苹整理.金匱要略[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44.
- [3]汉·张仲景述,晋·王叔和撰次,钱超尘,郝万山整理.伤寒论[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37.
- [4]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424.
- [5]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9:150.
- [6]唐·王焘.外台秘要[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1 000.

这首先要我们来分析一下郑氏的学术思想。

关于其学术思想,下面几段文字可见端的。(1)“尝闻各家著作,皆有精义,……思之日久,偶悟得天地一阴阳耳。分之为亿万阴阳,合之为一阴阳。知此,始明仲景之六经还是一经,人身之五气还是一气,三焦还是一焦,万病总在阴阳之中”^[1]。(2)“医学一途,不难于用药,而难于识症,亦不难于识症,而难于识阴阳……学医于芷唐刘老夫子,指示《黄帝内经》、《周易》太极、仲景立方立法之旨,余沉潜于斯二十余载,始知人身阴阳合一之道……”^[1]从以上的叙述中,明显可以看出郑钦安的学术理论主要宗《内经》、仲景之法,临证以辨阴阳为主。但此“阴阳辨证”与仲景之“阴阳辨证”还有一些不同,仲景

- [7]宋·陈文中.陈氏小儿病源方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253.
- [8]宋·钱乙著,阎孝忠编集,郭君双整理.小儿药证直诀[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4.
- [9]宋·佚名.小儿卫生总微论方[M].上海:华夏出版社,1997:190.
- [10]宋·太平惠民和剂局编,刘景源点校.太平惠民和剂局方[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5:178.
- [11]南宋·刘昉.幼幼新书(见于《刘昉、钱乙医学全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5:580.
- [12]元·曾世荣撰,田代华整理.活幼心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88.
- [13]明·薛铠,薛己.保婴撮要[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505.
- [14]明·鲁伯嗣.婴童百问[M].广州: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2005:25.
- [15]明·王肯堂.证治准绳[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1 685.
- [16]明·王奎.幼科类萃[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4:68.
- [17]清·芝岭樵客.儿科醒[M].北京:中国书店影印,1987:24.
- [18]清·陈复正.幼幼集成[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143.
- [19]清·沈金鳌.幼科释谜[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105.
- [20]清·吴谦等编.医宗金鉴(中册)[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1 113.

(收稿日期:2008-08-13)

虽亦强调阴阳辨证,但指导临床用药,还以六经辨证为要;而郑氏用药,则直接以阴阳辨证为依据。而且还明确提出一些辨别阴证、阳证的典型症状,对指导临证用药有实际意义。“予考究多年,用药有一点真机,与众不同。无论一切上、中、下部诸病,不问男妇老幼,且见舌青、满口津液,脉悉无神,其人安静,唇口淡白,口不渴既渴喜冷饮,二便自利者,既外现大热身疼头痛、目肿、口疮一切诸症,一概不究,用药专在这先天立极真种子上治之,百发百中;……专在这先天立极之元阴上求之,百发百中……”^[1]。何绍奇总结其提出的阴证依据有少神或无神,喜卧懒言、四肢困乏无力等13个症状,扼要地说,突出在一个“神”字,凡是“起居、动静、言语、脉息、面色,一切无神”,即是阳气虚衰的阴证^[2]。

2 附子使用的根源及开创性

那么“用药专在这先天立极真种子上治之”,又何以独钟姜附呢?毕竟在他之前,医家们对于附子运用都持非常谨慎态度,而病人更是“甘死于参、芪、归、地之流,怕亡于姜、附、硝、黄之辈”^[3],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好用姜附”是难以想象的。对此,郑钦安在其著作《医法圆通》、《医理真传》中都未明说。但通过分析,可以大致得出以下几个理由:第一、自明代以来,以张景岳为代表的一些医家对于附子的功效甚为推崇,这就为以后的医家运用附子提供了一定的借鉴。第二、郑氏学宗仲景,而仲景又是善用附子第一人,郑氏因此对附子比较重视也是情理之中。第三、历代学宗仲景者不乏其人,但在临床运用附子方面却都不及仲景,郑钦安对此有比较深刻的认识:“阴阳二字,万变万化。……无奈仲景之后,自唐宋元明以逮本朝,识此者固有,不识者最多……溯本求源,实由于不读仲景书,徒记几个幸中方子,略记得些各品药性,……试问尚能知道阴阳之至理乎?东家被他桂、附治死,西家被他硝、黄送命……此皆医门之不幸,亦当世之通弊也”^[3]。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郑氏所言在今天中医临床当中,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鉴于他当时对此认识有如此之深刻,敢不囿于前人的束缚,一反当时用药之流弊,善用姜附,是可以理解的。

仔细分析《医法圆通》、《医理真传》中所记,我们发现,在包括内、妇、外、儿、传染病各科一百多种病症中郑钦安都有运用附子的记载。比如咳嗽、呕吐、泄泻、腰痛、头痛、唇口红肿、齿牙肿痛、口臭、喉蛾、臂痛、筋挛、心痛、胃痛、二便不利、淋证、失眠、健忘、胀满、中风、淋浊、痿痹,等等等等,门内遍及于五

脏六腑、外感内伤。可以这么说,在这么大的临床范围内运用附子,郑钦安是第一人。

3 附子使用剂量问题

关于附子临床使用剂量问题是目前附子研究中的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在各种临床文献报道中,不时见有超大剂量使用,而且有一批医家以善用大剂量附子而闻名。《医理真传》中标明剂量的方剂有47首,包括“阳虚证问答”卷18首、“阴虚证问答”卷22首、“杂问”卷7首。共有含附子的方剂11首,其中附子用“一两”者3首,用“一枚”者4首,均为汤方,无超过一两或一枚者方剂。其余剂量均在“八钱”以下。按《中药药性论》得出的古今度量衡换算法,清代“一两”约合现在34g。以“枚”论,由于郑钦安时代离现在不远,一枚附子当与现在的差不多大,可按10~15g计,那么用“一两”是大剂量应用,“一枚”则不是。但是有一个问题,由于郑钦安并无完整的病案流传,附子的具体运用就不清楚。首先是煎服法的问题,如果只取头煎,则可以说郑钦安并未用大剂量附子。但是,在清代已采用“一剂两煎”的煎药法,如《程杏轩医案·续录·别驾菽田何公仆妇子痢》中有“头煎服后,其搐渐平,随服二煎,搐定头痛亦减”;《吴鞠通医案·卷一·温疫》中也有“头煎一茶杯,二煎一茶杯,三次服”的记载,如果郑钦安亦采用此煎服法,则其附子剂量“一两”者当属大剂量使用。另外,在附子制毒这一重要之处,郑钦安没有任何记载,无从考证他是否知道被后世医家广泛采用的“先煎久煮”方法,如果郑氏不知道这一点,则应用大剂量附子可能性就很小。总之,由于郑钦安没有完整的病案流传下来,其附子应用剂量难以得出肯定的结论。

综上所述,郑钦安学术思想主要表现在阴阳辨证,尤重阳气,对于阳虚辨证要点和温阳药物的使用都有自己独到见解。他对附子临床应用的贡献是巨大的,表现在:(1)继仲景之后,开创了附子临床运用的新局面;(2)拓宽了附子的临床应用范围;(3)使临床应用附子有更加切实可行的依据。

参考文献

- [1]清·郑钦安.医理真传[M].钦安用药金针,光绪丁亥年新刊,五福堂藏本版.
- [2]何绍奇.“火神”郑钦安[N].中国中医报,2003-02-17(3).
- [3]清·郑钦安.医法圆通·卷一·用药弊端说[M].光绪丁亥年新刊,五福堂藏本版.

(收稿日期:2008-06-03)